

目 录

回忆毛主席率领红军攻打漳州 罗 明 (1)

周恩来同志大革命时期在广东的革命

活动补充资料两则:

(一) 周恩来同志代表民族解放协会在广州警告示

威大会上的讲话

..... 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室供稿 (12)

(二) 关于周总理一九二七年经陆丰转去香港的

经过情况的补充调查 刘志远 (15)

张民达传略 根据张慕融遗稿整理 (22)

十九路军史略 陈燕茂 黄和春 (42)

蔡廷锴传略 林一元 余勉群 (89)

国民党第六十二军赴台湾接受日军投降纪实

..... 黄 涛 林伟涛 侯 梅 (115)

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华侨学生概况

..... 曾其清 曾俊伟 遗稿 (140)

雅加达中华会馆的沿革及其所办的社会事业

..... 梁德坤 (148)

马来亚华侨抗日史略 林穆光 (161)

新西兰华侨概况的忆述

.....杨汤城口述 李松庵整理(176)

闻一多被暗杀案的内幕.....程一鸣(197)

回忆毛主席率领红军攻打漳州

罗 明

毛主席率领红军攻打漳州，是在中央苏区取得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排除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而发动的一次重要战役。是毛主席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和人民战争各项军事原则指导下采取的一次重大军事行动。它和当时无数的战役一样，充分证明了毛主席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正确。

—

大革命失败后，毛主席于一九二七年九月亲自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义，并于十月间进军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从而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中心城市的革命道路。一九二八年四月，朱德总司令率领南昌起义的部队前来会师，成立了红四军。一九二九年，红军从井冈山向赣南、闽西挺进，开辟了以江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就在革命斗争实践过程中，毛主席丰富和发展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和路线，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并且初步形成了

1

人民战争的各项军事原则，这就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原则；战略上以少胜多，战术上以多胜少，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原则；开展地方游击战争，配合中央红军的运动战，机动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的原则，等等。正是在毛主席这一政治和军事路线的指引下，接连三次粉碎了敌人先后以十万、二十万、三十万兵力对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发动的反革命“围剿”，使根据地和红军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壮大。

但是，一九三一年一月，王明路线控制了中央领导权，在反对所谓“右倾”的口号下，推行了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的机会主义路线。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二年六月，先后作了七次决议，要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他们认为，中国存在直接的革命形势，党的总路线是进攻的路线，争取工农民主专政在全中国的胜利，并迅速地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三二年春，第三次反“围剿”战争取得胜利以后，由于受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临时中央的《通知》的影响，违反毛主席历来的主张，把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开去硬打赣州。其目的不是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是要攻占赣州城，把中央党政机关搬进去，然后再进攻南昌。结果因敌人守备较为坚固，久攻不下，处于进退两难的被动境地。这时，只得急电在东华山休养的毛主席赶往赣州前线。一九三二年二月召开了江口会议，江口会议是军事会议，由一三五军团各军长和政委参加，讨论形势和军事任务问题。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少数同志仍然主张再攻，认为红军完全有力量打下赣州。多数同志主张撤军，认为在当时条件下，进行阵地攻坚，硬拼硬打，势必会遭受严重的损失，而且即使占领赣州也不易固守。毛主席同意后一种意见，认为赣州三面环水，无回旋余地，如能诱敌出城，聚而歼之，还可以考虑，若

继续攻城，则等于啃硬骨头，没有油水。他还深入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指出：国民党反动政府迁都洛阳，暴露了他们对日寇侵略采取的不抵抗政策；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战，说明了在全国人民抗日反蒋运动的影响下，中间派有抗日民主的要求。估计敌人三次“围剿”失败后，暂时没有力量立即进攻苏区，但几个月后还会发动更大规模的“围剿”，我们要乘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的威力，选择敌人的弱点，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做好准备，粉碎敌人发动的新的反革命“围剿”。根据上述分析，毛主席提出从赣州撤军、乘敌不备远征漳州，消灭军阀张贞，支援抗日战争。经毛主席的耐心说服和七天会议的热烈讨论，终于同意了毛主席的主张，作出了攻打漳州的决定。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中国内战的特点，是‘围剿’和反‘围剿’的长期地反复和攻防两种战斗形式的长期地反复”。这正是对当时斗争实践的科学概括。中央苏区和其他革命根据地就是在这种“围剿”和反“围剿”的战争中不断巩固和发展壮大的。当敌人的“围剿”遭到失败之后，他们就由进攻转入防御，并且准备另一次新的“围剿”；而我们粉碎敌人“围剿”之后，则由防御转入进攻，并紧接着准备进行另一次反“围剿”的革命战争。红军攻打漳州和胜利回师，正是在粉碎了敌人第三次“围剿”之后，为了扩展胜利的成果，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发展闽南地方游击战争，收缴敌人的军事物资，准备进行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军事战役。

二

江口会议后，中央红军从一军团和五军团内三个军组成东路

军和红军第十二军，由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亲自领导和指挥攻打漳州。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中央红军朱德总司令、叶剑英总参谋长、东路军聂荣臻政委等共同研究制定了攻打漳州的战略决策。

一九三二年四月一日，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东路军总部到达福建汀州。当时，我在汀州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毛主席通知我于二日下午召开省委会议，讨论进攻漳州的政治军事部署。省委常委张鼎丞、刘晓、郭滴人、李明光、谭震林等同志出席了会议。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东路军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和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等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开始时，毛主席宣布：在第三次反“围剿”革命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中央红军乘胜来福建进攻漳州，主要任务是消灭漳州军阀张贞师，缴获敌人的枪弹等军事物资，帮助闽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扩大抗日宣传。同时，说明了红军的进攻部署：东路军已南下会昌，向福建武平东进，十二军现由汀州出发经长汀进攻上杭县城，并与东路军会师，准备经龙岩直下进攻漳州。他反复说明红军进攻漳州，完成上述任务后就回师中央苏区，不长期占领漳州，要求省委和各县干部群众要有正确的认识，从思想上和工作上作好充分的准备。毛主席极注意调查研究，了解敌人的情况，对着桌上的军事地图，向我们详细询问张贞师的最新军情和漳州的军事地形，甚至对漳州城北一道桥梁的细节情况也加以询问。会上周恩来副主席指示福建省委领导各县做好政治动员，供应粮食，调动地方武装保卫后方和军事要道，组织工农运输队，以及做好其他有关配合工作。会议还决定由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发表宣言，号召闽西工农群众立即动员起来，配合中央红军与敌人作战，消灭漳州军阀张贞、杨逢年，消灭广东军阀李扬

敬、黄任寰，开展地方游击战争，反对军阀进攻苏区，打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宣言内容要使敌人看不出红军行动的主攻方向。会议开了一个下午，直到黄昏才结束。会后，福建省委连夜打电话，发通知，并写好准备于四月五日发表的宣言。

会后两天，毛主席和警卫班，由一个省苏维埃干部陪同，经长汀河田乘船前往上杭县城；我则陪同周恩来副主席到长汀县所属区乡视察动员情况，在长桥夹乡召开基层干部会议进行调查。周副主席工作认真深入，对干部和群众关怀备至，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们深受教育。

毛主席到了上杭县城后，召开军事会议，进一步讨论了进攻漳州的作战计划，随即率领东路军向龙岩前进。他在上杭时还打电话给省委，要我赶去随红军出发。我到了上杭县城后，与上杭县委和省委所派随红十二军的工作组商谈了支援红军的动员工作。随即经白沙、大池等地，照红军行军方向赶路。沿途各地工农群众已经动员起来了。他们每人愿省出三升米，送到行军路上各地设立的粮站，低价卖给红军。一路都有群众为红军送信带路；地方武装加紧赤色戒严，巩固后方和交通要道，打击反动分子的造谣捣乱活动；上杭、永定、武平的地方武装还向边区以外进行游击，骚扰和打击敌人；各地很多群众参加了工农红军，到前方参加战斗；数千随红军出发的工农运输队，自带粮食、扁担、绳袋，边走边笑，络绎不绝。

红军东路军各部队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给予驻守在龙岩、永定、坎市一线的杨逢年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进击，迅速消灭了该旅，俘虏了许多敌人官兵，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红军指战员和龙岩的人民群众大为振奋。经过稍事休整后，红军就马不停蹄，人不歇脚地乘胜向漳州进发。

我们到龙岩后，东路军原属五军团的部队派出一个班护送我们。在途经马坑到适中时，我们还亲眼看见五军团十三军政委何长工同志率领的部队围攻反动民团的炮楼，正进行着激烈的战斗。我们和何长工同志作了简短的晤谈，迅即经水潮、金龙山向南靖县继续赶路，地主民团在山坡上不断向我们开枪。这时，从前线传来了密集的枪炮声，我军正勇猛地追击敌人。

军阀张贞在得悉防守前沿阵地的杨逢年旅被消灭后，急忙派出主力部队，以天宝为中心，建立防线，扼守西北天宝山，风霜岭和十二岭，企图凭险阻挡红军。我军于四月十九日发起猛攻，翻山越岭，从正面和两侧冲杀和袭击敌军，迅速占领了敌人的山头阵地，敌防线立即土崩瓦解，敌军争相逃跑，陷于一片混乱。这时，我军以及后勤人员和工农运输队员在山下四面高喊“缴枪不杀”，敌人无不为之胆寒，纷纷举手投降。红军活捉了敌军一旅长，俘虏士兵数千人，缴获很多枪枝弹药等军事物资。

经此一战，歼灭了张贞师的主力，二十日我红军攻占了漳州城。军阀张贞、杨逢年和陈国辉仅带些残敌惊慌逃走。他们临走时放火烧了一个弹药库，我们入城时还有闪闪火光和爆炸响声。

漳州战役胜利的取得，除了毛主席和各领导同志的正确指挥和红军指战员英勇战斗以外，与地方党组织、地方武装和工农群众的密切配合也是分不开的。漳州、厦门等地的党组织做了大量的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和瓦解敌军的工作，地方武装配合红军在敌后展开游击活动，不断打击敌人。在天宝战斗结束时，游击队还协助红军收缴敌人的武器。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当红军攻进漳州的时候，闽南党组织的负责人李金发同志带队入城，在扫荡残敌的战斗中，光荣牺牲了。李金发同志不愧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位

坚强战士。他和在这次战役中英勇牺牲的同志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三

我军占领漳州后，在毛主席领导下，立即着手建立地方政权，协助组织地方武装，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和大规模的宣传活动。

红军东路军司令部驻在芝山天主教堂，毛主席住在天主教堂附近一间楼房的二楼，由吴洁清、陈昌奉等警卫班的同志负责保卫工作。我们住在楼下一个房间。毛主席亲切地和我们谈话，要我们协同政治部与漳州地下党组织联系，配合部队在漳州和各县发动群众斗争。他在二楼召开过多次政治军事会议，讨论形势和任务。漳州和厦门的地下党领导干部邓子恢、蔡协民、曾志、王海萍等同志先后来芝山联系。毛主席亲切接见了他们，并对地方工作作了许多重要的指示。

在漳州，召开了工农和各界代表会议，于四月二十七日宣布成立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由王占春同志任主席，负责领导地方革命工作。

“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由政治部在漳州召开了有一万多城乡群众参加的盛大群众大会。会上由红军代表讲话后，我也代表福建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讲了话，号召人民群众团结起来，拥护中央红军，反对蒋介石军阀官僚反动政府的压迫和剥削，在闽南革命委员会领导下展开斗争，并和全国人民一起，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会上被俘虏来的张贞师的参谋长表示向人民认罪。整个会场群情激昂，热烈欢呼红军的胜利！

红军攻占漳州后，各部队分别驻在漳州、石码、海澄、嵩屿

江东桥、漳浦、云霄、小溪，以及长泰、南靖天宝、小山城、金龙山、水潮等地，协助地方成立工会农会，组织和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废除苛捐杂税和高利贷，烧毁地契、债据，并建立地方武装，以对付土豪恶棍，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由于红军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并实行保护工商业政策，深受工农群众和工商业各界的欢迎和拥护。许多工商业家自愿为红军筹款，只有漳州一家胶鞋公司的经理进行反动破坏活动，后由政治部将该公司胶鞋没收，发给红军战士，同时，还没收了军阀张贞的官僚资本财产，分给工农群众。

红军进攻漳州，不仅俘虏了大批敌军官兵，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还缴获了大量的军事物资。张贞以“围剿”苏区为名，向蒋介石不断索取军事装备。这次绝大部分为我缴获。军阀张贞还有两架飞机，一架在飞行侦察时被我军用机枪击伤，飞回机场后不能再飞，被我俘获，另一架逃往厦门。缴获的所有军事装备，都由闽西工农运输队运回中央苏区。

“五一”节过后数天，毛主席和我谈话，说明中央红军不在漳州久留，要我与闽南地方党组织商量，抓紧时机，进一步开展群众斗争，把枪弹发下去，扩大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开展当地的游击战争。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红军的协助下，成立了闽南红军第三团，由冯翌飞同志任团长，中央红军留下的尹利东同志（又名尹林平）任副团长（后任团长），王占春同志兼任党代表，蔡协民同志任政治部主任。红三团在闽南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同时，原广东饶平、大埔和福建平和县因暴动受挫失去联系后来漳州做工的二百多人，由闽南党组织和革委会编成了饶和埔独立大队，由张大伟同志任队

长，温仰春同志任政委，准备回原地开展游击战争，后因交通阻隔未去，编入了红军十二军三十四师。中央红军进攻漳州，不仅扩大了中央红军，而且也扩大了地方红军和各地游击队。国共合作抗日时，仅漳浦游击区的武装游击队就发展到了一千多人。一九三七年驻漳州的国民党一五七师以国共合作抗日为名，诱骗我游击队队长何鸣带一队游击队下山到漳浦城，结果被他们缴械。这就是闽南有名的“何鸣事件”。随后漳州地区游击队还集中一千余人参加新四军进行抗日战争。

红军在漳州期间，还积极开展了抗日宣传活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四月十四日颁布了对日作战的总动员令，中央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表的宣言，要求各党各派、各军在抗日民主和停止进攻苏区等三个条件下，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红军攻打漳州沿途进行广泛宣传，并揭露了蒋介石政权“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国的斗争。我们党不仅提出了抗日救国的主张，而且以实际行动表明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是具有严明纪律的为人民服务的队伍。这不仅影响了全国人民，而且使海外侨胞深受感动。这对后来国内外同胞拥护共产党，积极参加和支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完成了上述各项任务之后，红军准备撤出漳州。这时，张贞师的覆没和漳州被我红军攻占，使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惊恐万状，急忙把在上海进行抗战的十九路军调往厦门驻防。日本和英美帝国主义的数艘军舰也开进厦门海港，晚上还向漳州石码嵩屿等沿海地区放射探照灯，害怕红军进攻厦门。

毛主席还十分重视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当时，在红军实际行动的影响和地方党组织的动员之下，漳州各地以至厦门不仅

有很多学生和教师前来报名参加红军，而且还有不少学生、教师和艺术工作者写信，请求毛泽东主席“招贤纳士”。毛主席把这许多信件交给我，要我联系并帮助他们随红军到苏区工作。后来福建省委来电要我赶回汀州，我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司令部要我协助押运员，送一大批较为重要的军事物资回苏区。当时由我负责联系的学生、教师等一百多人（其中有歌唱家和一位姓蔡的台湾省籍的小提琴家）随我们一起出发。此外，还有运送军事物资的汽车司机到了水湖站后，也随我们由山路进入苏区。

五月下旬，中央红军分批主动撤出漳州。“五卅”纪念日，汀州、龙岩等地举行了庆祝红军胜利回师大会。红军撤出漳州后，在毛主席的率领下，经龙岩、上杭、武平到会昌、信丰，和朱德总司令率领的以三军团为主的中央红军在广东南雄会师，于七月间在水口又打垮了广东军阀陈济棠十余个团，取得了“水口战役”的胜利。

回想毛主席在汀州福建省委会议上所作的部署，由于中央红军攻占漳州和胜利回师，终于成了现实。

事实充分证明，漳州战役的胜利，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胜利，无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有重大的意义。

记得在红军攻占漳州后，毛主席有一次和我们谈话时说：“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门打狗，怀疑我们能深入白区打仗。这次中央红军从江西走了几百里路，一下子就打到这里，消灭了整师的敌人，取得了大胜利。”

毛主席后来在其《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作了深刻的总结，其中对红军攻打漳州也作了充分肯定，并批判了不同意打漳州等各种错误思想。他说：“由于看不见根据地人民的力量，常常发生惧怕红军远离根据地的错误心

理。这种心理在一九三二年江西红军逃出打福建的漳州时，一九三三年第四次反‘围剿’战役胜利后红军转向福建进攻时，都曾发生过。前者惧怕整个根据地被占，后者惧怕根据地的一部被占，而反对集中兵力，主张分兵把守，结果都证明不对。”这就是对红军攻打漳州并胜利回师所作的历史结论。

写于毛主席诞辰八十五周年

周恩来同志大革命时期在广东的革命活动补充资料两则：

（一）周恩来同志代表民族解放协会在 广州警告示威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二四年十月十日）

全会场中的革命国民：我们今日度此双十节，均知双十节的来源是由于辛亥革命。但辛亥革命实际上并未成功，我们既无庆祝之必要，更无欢乐之可言。因此，我们乃将这个不应庆祝的双十节改为双十警告节，来警告一切破坏革命的反动派。我们知道辛亥革命方将成功时，袁世凯曾利用他所倚赖的北洋军队压服革命党，乘机夺取了民国的政权，造成军阀祸乱之开始。二次革命发生，袁世凯倚仗帝国主义新银行团大借款的助力，遂削平南方，驱逐了所有革命分子出国。袁世凯死，段祺瑞得着日本的后援，遂大批的拍卖中国。段祺瑞倒，曹锟、吴佩孚得着英美的后援，反动的局势，卖国的成绩，更加倍的制造起来。同时奉皖两派军阀还是或明或暗的与日本发生密切的关系。不但北方如此，便是南方的新军阀，也都有他们各一派的帝国主义做后援，陈炯明与英国的关系是个最明显的例子。不但军阀如此，一切官僚政客也都与帝国主义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至于买办阶级洋货商人，他们的卖国行为是更加显著。总起这一干人，不论帝国主义者，军阀政客，官僚或是买办与洋货商人，他们统都是革命的对头。

辛亥革命的重大意义是要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共和国。而这类反革命派，他们都是随着帝国主义来破坏中国独立的，反对中国民主的，永不愿实现中国共和的。我们为要使辛亥革命彻底成功，我们必须团结起全中国的革命民众向反革命派进攻，也就是团结起今日到会的革命的工人、农民、兵士、学生、商人，向四周围的反革命派进攻。我们为要使中国真正独立，真正共和，我们才不愿将双十节作庆祝节过而改作警告节。所以今日到会来过警告节的人，至少都是赞成向反革命派进攻的。我们不要以为反革命派的势力极大，反革命派的气焰日张，我们只要下我们团结的决心，我们有工人可以武装，有农民可以自卫，有兵士可以作先驱，有学生可以作宣传，有商人可以作后盾，我们的实力便在此处。号召我们的实力，复活辛亥革命的精神！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南北军阀！打倒一切反革命派！全场的革命民众啊，我们团结起冲出公园去向反革命派做示威运动！

说 明

这篇文献是周恩来同志在一九二四年十月十日广州召开的“警告示威大会”上的演说词，原载于一九二四年十月十四日香港出版的《中国新闻报》。

一九二四年八月，为陈廉伯所控制的广州商团，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怂恿下，积极进行反对孙中山的叛乱活动，激起广东革命人民和广州各革命团体的极大愤慨。为表示对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军阀等反革命势力的抗议，十月十日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发动广州的革命群众在第一公园（今人民公园）举行警告示威大会。与会者有民族解放协会、反帝国主义运动大同盟、广州市工人代表会、广东警卫军讲武堂、广州学生联合会、广东工团军、农民自卫军、建国宣传团、广东油业总工会、汉文排字工社、国民

党联义社、酒业工会、船主司机工会、图强女医学校、劳工妇女学校、全省建筑总工会、改造惠州同志会、农工旬刊社等数十个团体，还有临时参加的民众约五、六千人。会场上高悬“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标语。群众团体的代表发言声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行，揭露商团的反革命面目。周恩来同志出席了这次大会并代表民族解放协会发表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针对当时的时局，强调“团结起全中国的革命民众向反革命派进攻”，实现“真正独立，真正共和”，给与会群众很大的鼓舞（见一九二四年十月十日《双十特刊》第七页）。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当队伍行至太平路时，预伏的商团突然开枪射击，革命群众死伤数十人，更有落水失踪者，有些尸体甚至被斩首、剖心。“双十”反革命事件发生后，引起了群众的极大义愤。中国共产党广州地方执委会随即发表《告广州市民书》，揭露这一屠杀的反革命实质，然后指出：国民党政府只有领导工农兵学进行革命，建立工农兵学革命大同盟，才能坚决打击反革命派以保卫革命（见《双十特刊》第三九-四一页）。参加“双十”游行的十六个团体当天还组织了“工农兵学革命大同盟”并发表宣言，要求解散商团，严惩凶手，动员革命人民群众“与反革命决一死战”（见一九二四年十月十日香港《中国新闻报》）。

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室

（二）关于周总理一九二七年来陆丰 转去香港的经过情况的补充调查

刘 志 远

去年，在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我介绍过一点关于周总理一九二七年来到陆丰，后来由陆丰地方党组织派黄秀文同志护送到香港的经过情况，作为提供线索（内容已见于《广东文史资料》第二十二辑）。事后，我感到仅提供这么一点线索还是很不够的。幸好去年十月至十一月有事到海丰，乘此机会，作了一些调查，还专程到陆丰去，走访有关同志和部门领导人。虽然时间短促，但在当地群众和干部的热情帮助下，也算收集补充了一些资料。

我首先在陆丰县城找到几个知道线索的人分别交谈，据说：在一九七八年一月总理去世两周年的时候，陆丰东海镇街上出现一张大字报，专门介绍周总理经陆丰到香港的经过情况，很多人围着看，激起了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无比缅怀，到处议论纷纷。县委对此事十分重视，立即指定县负责文史资料工作的干部沈少雄同志作调查，从各方面搜集资料。沈少雄告诉我，说他在调查中曾听说当年周总理从陆丰去香港，是聂荣臻同志参加护送的。另外，在一九五八年汕头地委根据群众关于周总理从陆丰去香港的